



思想的激流

20 世纪社会思潮概论

季广茂 著

江月 清泉 主编
泰山出版社



泰山·世纪回眸丛书

思想的激流

——20 世纪社会思潮概论

季广茂 著

泰山·世纪回眸丛书

思想的激流

——20 世纪社会思潮概论

著者/季广茂

出版/泰山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山东日照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3.75

字数/326 千

印数/1—5000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159—5/Z·29

定价/21.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编:250001 电话:2062166—6073

目 录

总述	潮起潮落又百年	(1)
引言	一个世纪的沉重叹息	(19)
	1. 世纪的分量	(19)
	2. 往昔的荣光	(21)
	3. 中国的走向	(24)
	4. 连绵的动荡	(28)
	5. 不尽的思量	(32)
	6. 时代的波浪	(34)
一	科学, 现代神话中的翩翩王子	
	——科学主义辨析	(40)
	1. 科学的金装	(40)
	2. 社会的震荡	(48)
	3. 异味的果实	(59)
	4. 痴情的颂歌	(66)
	5. 世纪的魔方	(72)
	6. 冷静的反思	(78)
	7. 深长的余响	(89)
	8. 世纪的回想	(95)
二	实证,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实证主义剖析	(102)



1. 实证家族的“谱系”	(102)
2. 一败涂地的“价值”	(109)
3. 一步登天的“证据”	(118)
4. “方法”的大旗高高飘扬	(132)
5. “认识”的城堡固若金汤	(139)
6. “本体”的阵地——沦丧	(149)
三 进化,生死间的艰难抉择	
——进化主义解析	(158)
1. 进化论,以科学的名义	(158)
2. 进化论,非科学的涵义	(166)
3. 进化论,求解放的利器	(171)
4. 进化论,一百年的启示	(192)
四 百年的梦想,世纪的辉煌	
——马克思主义探析	(208)
1. 人类的希望	(208)
2. 高深的思想	(211)
3. 精美的哲学	(223)
4. 改良的主张	(230)
5. 革命的宝典	(240)
6. 西域的变调	(246)
7. 东方的强音	(260)
8. 进步的灯塔	(285)
五 保守,痴心一片守梦乡	
——保守主义缕析	(287)
1. “幽灵”在游荡	(287)
2. “文化”迷魂汤	(294)
3. “直觉”太极图	(305)
4. “相对”火牛阵	(306)

5. “东方”乌托邦·····	(307)
6. “复古”点金术·····	(309)
7. “民族”招魂曲·····	(313)
8. “民粹”一指禅·····	(330)
9. “东亚”温柔乡·····	(333)
10. “救世”奉献狂·····	(337)
11. “后学”又一村·····	(342)
12. “保守”须思量·····	(357)
六 谁能告诉我,人是什么	
——人本主义浅析·····	(362)
1. 人与人性的重重迷雾·····	(363)
2. 人与人本的道道迷彰·····	(370)
3. 科学主义对人的误解·····	(383)
4. 文化主义对人的理解·····	(386)
5. 自由主义对人的注解·····	(393)
6. 现代中国对人的把握·····	(399)
主要参考文献·····	(421)
中文部分·····	(421)
外文部分·····	(424)
后记 渴望常识·····	(428)

总述 潮起潮落又百年

引言 一个世纪的沉重叹息 “世纪”不仅是计量年代的单位,而且是沾染着血泪、荣辱、生死的文化概念。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沉重的一个世纪,人类在这个世纪里创造了许多奇迹。正是在 20 世纪,中国走出传统步入现代,从天朝上国汇入世界洪流之中。

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由如日中天到日薄西山,固然与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要从大清王朝内部“寻根”——大清王朝的根基在 18 世纪末就已经腐败不堪了。由盛转衰发生在 1770 年;此前,大清帝国强盛、繁荣、和平、稳定;此后,各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首先来自人口的膨胀和由此带来的沉重压力,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失调使得中国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黄河河床的上升,黄河、长江上游森林植被的毁坏,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不仅土地在减少,而且水灾频仍,沿河民众屡受各种自然灾害之苦,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至于稍遇灾荒即易子而食。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在残酷高压的专制政治体制中,受害农民除了揭竿而起别无选择。1774 年的山东王伦起义,1781 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1795 年的湘黔地区苗民起义,1796 年爆发并持续长达 9 年、足



迹遍及川、楚、陕、甘、豫五省的白莲教起义，1851年的太平军起义……都给满清统治者以致命的打击。

18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向中国输出鸦片，以补偿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此端一开，中国与西方有限的贸易交往就成了历史，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西由贸易冲突发展到军事政治冲突，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必然。自此以后，满清王朝面对的贸易对象不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商业集团，而是地位日益上升的西方众多独立商业、企业。愚蠢的满清政府所能设想出来的最好办法就是闭关自守——“俺不和你玩了”。尽管当时一些洋务派人士有自由贸易的主张，然而从有限贸易到闭关自守，再到在大炮的攻击下耻辱地开放门户，这就是清朝统治者所做出的“明智”选择。

19世纪中国的悲剧还在于，满清帝国的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并不缺乏治理国家的智慧、魅力与才能，但由她掌握政权却是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合法性的，她不具备皇帝的道德权威。为了弥补这个致命的缺陷，她不得不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手中来之不易的政治权力。顺理成章的是，一部晚清政治史便成为由慈禧操纵的洋务派与保守派互相斗争的政治平衡史。既然如此，那么抵抗列强、变法图强等问题就只是枝节末叶和方法手段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19世纪末叶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实际上葬送于清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而这一权力之争是由站在权力顶峰的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意安排和挑起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并形成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围绕着社会矛盾形成的、以观念为形态的思想运动，它肇始于知识分子却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活动。社会思潮是社

会需要的产物——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都是社会需要的结果,都昭示出社会需要的迫切性和深刻性:正是因为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及时有效地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它们才能成为“思想的潮流”。思潮是能满足一个时代的精神需要的思想潮流,是一个时代的思想的共同走向。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遭遇了亘古未遇之变局,步入了层层叠叠的危机之中。60年代我们大敌当前,90年代我们岌岌可危,20世纪初年我们大难临头。危机的时代需要也酿造危机的哲学。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社会思潮固然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和相同的——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都打着深深的“危机”烙印。中国20世纪社会思潮的形成、内涵与性质,与此种危机,存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1、科学主义辨析 在许多仁人志士眼里,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科学,他们把科学当成解决中国危机的灵丹妙药,科学主义渐渐在中国形成。科学主义是20世纪东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科学是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只有科学才能免除人类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只有科学才能使人类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只有科学才能完善人类的心灵世界,只有科学才能对宇宙及人生进行正确的阐释。科学是人类的福音,科学是人间的天籁,科学将把人类由人间的地狱带入幸福的天国。

现代科学诞生于完整的科学方法之中,而科学方法因归纳法和实验法成功,演绎法和数学法的结合而完成,从此开始了科学方法的扩张史。天文学和物理学最早选用了科学方法,并取得骄人“业绩”,培根和笛卡尔为此欢欣鼓舞,幻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基于这样的信念,科学以其坚实的知识和迷人的方法开始超越一般的自然现象的研究,冲击长期远离科学的知识领域。一些原本只是零零碎碎的知识,一经“科学方法”巧镀金身,摇身一变成为“科学”,受到万民的景仰和

膜拜。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在社会领域里不恰当的延伸,是“科学帝国主义”在“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推动之下,大肆“扩张”和大肆“侵略”的结果。

科学主义的确立既有其科学发展的前提,又有其坚实的哲学根基。哲学这棵智慧树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根深叶茂了,那时的泰勒斯就开始探究宇宙的本体问题,直到文艺复兴,哲学家依然执着于探索宇宙的本原与究竟问题。此外,科学主义是科学长足发展引发的社会性眩晕症,科学的进步是科学主义的推进器。在近代史上,有四个学科对人类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天文学(特别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物理学(特别是牛顿力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生物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

1840 年以前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也正是因为没有科学,才特别容易为西方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发作起“科学主义”癔症来也就特别剧烈。“科学”是中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最强音,“科学救国”是那个时代多数知识分子所达成的基本共识。他们经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发现了科学发展与人类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有意无意地放大了“科学”的功能,产生了“科学万能”及“科学方法万能”的错觉。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毛泽东都曾热情地讴歌科学。从中不难发现,科学不再是自然科学,它的重要性也不在于如何征服自然以造福于人类,科学在这里的真正含义是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科学不仅可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具有强大的社会解释功能;而且它还可以改造一切,征服一切。科学成了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方式,成了社会的旗帜、战斗的武器和人类的世界观。与此遥相呼应,中国的近代科学运动经历了一个由“用”和“技”到“体”和“道”的过程,即从知识层面渗透到价值层面的过程。

科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对科学的反思,人类在受益于科学

成果或科学方法的同时,对科学及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性的分析。科学主义本身确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存在着限制自己发展的严重困境。除了科学主义那没有根据的妄自尊大和不可一世,科学也不能完全、准确地阐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解决它曾经夸下海口、许诺解决的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题。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张君勱、梁漱溟都曾反思于此;科学和理性不是万能的,它们只是手段和方式,不是目的与价值,也无法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意义与价值问题。他们主张对科学与哲学的领域进行合理的划分,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这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科学和理性不是万能的,但他们不愿正视问题的另一面——没有科学和理性是万万不能的。抽掉了科学和理性,人类就失去了生存于现代社会的凭藉,温文尔雅的人文主义也会最终蜕变成歇斯底里的保守主义。它终于变成了这样的保守主义,并在 90 年代“发扬光大”起来。

科学对 20 世纪中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一,它深深塑造了国人的世界观;第二,它为其他外来思潮入主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大钊、陈独秀首先是科学主义的倡导者,然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因为有了“科学主义”的先入之见,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呈现出“科学”的一面。

科学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长驱直入,是因为它是批判传统文化之糟粕的封建迷信的有力工具。封建迷信之所以是封建迷信,是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原理,无法用范畴、定理、定律说明现象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科学”不仅在中国扮演了启蒙主义的角色,在其他需要启蒙的国度里也是如此。但科学毕竟不是万能的。如果说科学在批判封建迷信和教会、国家方面还算刚健有力,那么在社会建设方面却常常无能为力。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

限的。

2、实证主义剖析 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科学主义只是一种信仰,实证主义则是一种社会化、思潮化的哲学主张;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这“实证”的材料与方法既可以是逻辑(由此派生出“逻辑实证主义”),也可以是经验(由此派生出“经验批判主义”),还可以是科学(由此派生出“科学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固然与“逻辑”和“经验”密切相关,但它与“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实证主义萌芽于贝克莱和休姆的主观唯心主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形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后来穆勒以其逻辑学理论、斯宾塞以其“综合哲学”先后发展了实证主义,使其广泛流行起来,此为第一代实证主义。德国现象学的奠基人布伦坦诺、美国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和詹姆斯,都与实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证主义在19世纪末发生危机,产生了以奥地利的马赫和德国的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实证主义出现,其主要代表为卡尔纳普、石里克、艾耶尔和莱辛马赫所建立的逻辑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语言问题,试图把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它以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的语法和句法问题,自称是最彻底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像一个幽灵一样游来荡去,就是以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思潮,终究也没有逃脱实证主义的“魔掌”,实际上变成了“后实证主义”。波普尔的实证主义比逻辑实证主义更具“实证”色彩,是更加“实证”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渗透力由此可见一斑。

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都以形而上学(玄学、元学)为自己的天敌,都以反对形而上学的面目问世,甚至它们使用的概念也都是针对形而上学设计出来的。“打倒形而上学”是它城堡上飘扬的旗帜,也是它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所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最后都多多少少地建立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实证主义者还反对价值论和伦理学。

在西方，实证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是西方文化固有的产物。中国的实证主义是舶来品，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实证意识十分淡薄，中国人几乎没有“实证”的自觉。即使重视“实证”，这“实证”的内容与西方也是大异其趣。中国具有丰富的直觉顿悟思维和发达的辩证思维，但缺乏严格的形式化的逻辑思维。逻辑意识的淡薄，表明中国缺乏逻辑实证主义得以生长的土壤；科学技术的严重落后，意味着中国缺乏科学实证主义得以生存的环境。这些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认识论依附于伦理学。只是到了严复，中国哲学才有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分、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分野，才有了近代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为中国实证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实证主义的首倡者是严复，他引进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严复介绍过培根的“归纳法”。胡适把“科学”看成“思想和知识的法则”，要求“事事求诸证实”，而且“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丁文江直接开始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 20 年代的科玄论战中。进入 40 年代后，洪谦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介绍到中国，张申府创立了唯物论科学主义。自此以后，实证主义发扬光大起来，成为反对一种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而上学。

实证主义的泛滥造成的主要结果有三：一是方法论的张扬，二是知识论的扩张，三是本体论的衰亡。科学方法论的异军突起，是现代哲学的一件大事。虽然在什么才是“科学方法”的问题上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一致认定科学最根本的标志是“科学方法”。80 年代中期，哲学、文艺研究的数量化一度成为“挡不住的诱惑”，理论界热衷于用自然科学的概念解释复杂的生命



现象和艺术现象，“方法论”成为最热门、时髦的专业词汇。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哲学的认识论化，20世纪以来，认识论更是身价倍增，它几乎成了哲学的代名词；唯物论是认识论，辩证法是认识论，逻辑学是认识论——总之哲学就是认识论；历史是认识史，哲学史是认识史，科学史是认识史，语言史是认识史，心理学史是认识史——总之都是认识史。与之相呼应的则是本体论的衰亡。

3、进化主义解析 进化论在20世纪扮演了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角色。作为哲学理念的“进化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通变观——相信宇宙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变化之中，变化则生，不变则亡；其二是无神论——否定神创论和目的论，并用自然生存的方法解释生命的起源、发展与变化。人类自古以来就不乏以自然生存的方式解释宇宙生命的哲学冲动，但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进化论之所以为进化论，进化论之所以产生了那样强烈的社会影响，首先是因为它是一门缜密的“科学”。进化论迎合并推进了当时求发展求变化的历史潮流，动摇了西方经久不衰的神创论、特创论、目的论，给基督教以致命的打击。正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具有如此丰富的哲学、社会蕴含，反对科学、科学精神、科学主义的人总是拿它“开刀问斩”。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进化论是中国危机的最佳阐释工具，也是中华民族寻求解放的有力武器。严复要以物种生灭的自然进化规律，警告我们亡种、亡国、亡教的危险，激发国人发奋自强的雄心壮志，但他面临着道德理想主义与丛林法则的矛盾。这矛盾，还体现在严复的后继者身上，在章太炎、孙中山、朱执信等民主共和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与民主共和派人士的理解不同，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那里，进化论与《周易》一起成为改良主义的哲学基础，为变法维新提供合法性。而在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等民主主义者那里，进化论是批判传

统、改革社会的有力武器。在李大钊那里，进化论是反对哲学本体论、否定宗教宇宙观、批判孔孟之道的有力武器。在陈独秀那里，进化论既是救亡图存的社会哲学又是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这两点都准确迎合了“五四”时期的社会需求，从而使进化论在马克思主义引入之前，最后一次爆发出诱人的光辉和巨大的号召力。在鲁迅那里，进化论是一种带有尼采式个人主义印记的人生哲学。

进化论的传播和兴盛，给中国人留下了三大遗产：其一是强化了科学主义，其二是推进了进步主义，其三是启发了革命主义。除此之外，进化论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铺垫。

进化论之所以人主中国得益于它是一门“科学”，得益于国人对“科学”的真诚崇拜，并转而强化了这样的崇拜。进化论在中国还强化了进步主义观念，而且常常是直线性的进步主义观念。进化论还与形形色色的“革命”理论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虽然改良派常把进化论作为社会改良的理论依据。只是到了20世纪末年，有人对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又产生了怀疑，90年代后大倡“历史偶然性”的李泽厚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

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一直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从灾难走向灾难，仁人志士们把目光转向海外，积极从西方思想中寻求救国的真理。社会思想方面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自然科学方面的“以太说”、“星云说”、“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无不受到顶礼膜拜。这么多的主张、理论、见解、原理，最后只有进化论成为一种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具有如下几种别的主张、理论、见解、原理所不具备的功效：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巨大社会危机的策略和方法。第三，成为变法维新、民主革



命、批判传统的理论根据。第四,为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强弱确立了标准。但进化论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进化论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大而无当。第三,进化论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具有天然的脆弱性。第四,进化论无法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求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第五,进化论内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与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总之,进化论还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当时的变局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变策略,不能指明中国努力的方向,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所以它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是势所必然的。

4、马克思主义探析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影响而最广、渗透力最强的社会思潮。把马克思主义笼统地称为“科学”,不仅会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性质,而且会贬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马克思主义至少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时期、恩格斯时期、德国社民党时期、苏联时期、中国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它们分别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不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 10
首先,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做出一个基本的二分,不会损害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声誉和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神圣地位。《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非常完整地揭示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它是马克思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重大发展,当然马克思也做了一些取舍,他舍弃了自己不感兴趣的笛卡尔物理学及与其相关的认识论问题。比如在认识论问题上,马克思不相信有关真理的“符合论”。因此马克思不可能创立“自然哲学”,更不可能认为自然本身会按照“辩证法”的

规律运演变化,自然总是“人化”的自然。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对认识论不感兴趣并保持警惕,这与后世马克思主义对认识论的孜孜以求形成鲜明的对比。

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极端重视,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甚至一度成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宪法。恩格斯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但对黑格尔哲学具有极强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又有执着的追求。恩格斯哲学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当时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做一次有效的手术整合。与当时许多德国哲学家一样,他也深深陶醉于黑格尔哲学的迷宫,并试图整合浪漫派的自然哲学与深受笛卡尔、霍布斯“机械唯物主义”影响的实证科学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勾画出自己的理论纲要,辩证唯物主义从 90 年代起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就既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依据的是恩格斯的解释),又包括恩格斯在黑格尔体系的残骸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哲学本体论学说——“辩证唯物主义”。

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以晚期的恩格斯、早期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虽然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点,但也同时享有许多共同的理论假定。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六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第一,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与变化的唯一的和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第二,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不稳定的,它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持续性。第三,依据人们在社会经济生产结构中的位置的不同,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级斗争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先性与超越性。第四,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第五,资本主义通过工业的高度发展和集中化、资本的集中、生产技术的理性化这些过程,已经为社会